

司马光为官做人的品行修为

□ 唐诗宇



一谈及司马光，人们定能随口道出“司马光砸缸”的故事，也能立刻联想到《资治通鉴》这部史学著作，但是对于他的品德操守，世人却知之甚少。他之所以能够名垂史册，不只于世人所见到的成就，其后必有强大的精神品质作为支撑。

忠君报国,济世爱民

司马光（1019年—1086年），字君实，号迂叟，陕州夏县涑水乡（今山西夏县）人，世称涑水先生，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史学家和文学家。司马光一生历任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，从地方判官，到州府幕僚，再到学官言官，直至首辅宰相，在他长达49载为官生涯中，一直坚守着忠君之心、报国之志。

从其“砸缸救友”一事中，便可看出幼年的司马光就聪慧过人、机智勇敢。1038年，20岁时一举考中进士，从此步入仕林。但他并没有骄傲自满，而是说道：“贤者居世，会当履义蹈仁，以德自显，区区外名何足传邪！”足可见其不图虚荣、心怀抱负。

从政初期，司马光先后前往华州、苏州、韦城等地方任职为官，其间深入民间走访、了解民众疾苦、体恤下层百姓，很快便赢得了“政声赫然，民称之”的美誉。在关怀百姓的同时，司马光亦关心国家。1047年，年仅29岁的司马光闻知贝州城农民起义一事，便立刻写了《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》给当时掌管全国军事的庞籍，以为平息动乱建言献策。其后，司马光经时任宰相庞籍的举荐，先后担任过馆阁校勘、殿中丞、郢州典学等职，使其积累了一定的史学素养。

1055年，司马光随庞籍前往并州任通判。1058年后便回到开封任职。在此期间，他一方面关注朝堂，刚正执掌，不惧生死。虽深知“臣言此，自谓必死”，但依旧连上三状《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》，请求仁宗早日立储，以稳定朝堂。感念其忠心赤胆，最终皇帝非但没怪罪，反而采纳建议立赵

曙为太子。同时他也居安思危，大度举贤对边事很有研究的刘瑗，以安定边防。此外，针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危机，司马光也连连向宋仁宗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，提出了为君之德有三言，即仁、明、武；后者论述了朝廷选人用人之道，这两部著作对当朝皇帝和官员都有很大的影响。另一方面他也关心下层，心系民生，同情百姓。在洛阳为官时，他不忘乡亲父老，每年都会回乡探亲并体察民情。很多地方官员想要设宴款待，但无一例外都被回绝了，原因是民众仍食不果腹，自己无心享受美酒佳肴。他在《论财利疏》中对民生疾苦描述道：农民苦身劳力，粗衣粗食，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，负担各种劳役。收成好的年代，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，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，甚至冻饿而死。对此司马光认为，只有“利民”才能“安国”，所以他建议皇帝采取“养民”之策，减轻繁重的赋税徭役，同时开源节流，严惩贪官污吏。因其一生忠君效国、忧国忧民，世人尊称他为“社稷之臣”。

崇俭戒奢,廉洁自律

司马光在官场驰骋数十载，虽身居高位、声誉远扬，却不贪图享乐、不贪恋权贵，而是崇尚节俭、清正一生，不仅自己做到廉洁奉公、两袖清风，同时亦要求他人干净为人、清廉为官。

独善其身，稳得住操守。北宋时期“高官厚禄”可谓名副其实，官员的俸禄极差大，品级越高，所享财富越多。而司马光却是例外，并非没有，而是不贪。1063年，仁宗皇帝驾崩，英宗继位，豪赏群臣，挥金如土。司马光当时身居四品，可以获遗赐一大笔金银珠宝。在众人乐不可支之时，司马光却没有随波逐流、同流合污，反而看着这些赏赐深觉不妥、忧心如焚，于是先后两次上书表示对此举的意见，并预备带动朝堂官员将赏赐捐出。可惜事与愿违，不仅上表未果，而且无人响应，无奈之下只好将自己所得全部捐给谏院充公和补贴亲友。他的执着与定力，廉正与操守，无疑是后代为官者的榜样。

节俭朴素，耐得住清苦。司马光生于官宦之家，虽家境殷实，但不骄不奢、简朴一生。幼年时，大人们为其准备的华美衣裳，他总会放到一旁不好意思穿戴。成人后，入仕为官却朴素依旧。一次好友范镇前往司马光

的住处去看望他，踏进屋内，只见家徒四壁，除简单家具和成堆书籍外再无其他，被褥也布满补丁。范镇回到家后因同情其清苦，便叫夫人做了一床被子送给他。司马光收到后颇为感动，在被头亲笔用隶书写到：此物为好友范镇所赠。而这床被子从此伴随他直至入土。人到暮年，他依旧艰苦朴素、赤贫如洗。老友刘贤良准备买一婢女侍奉体弱的司马光，可他却谢绝道：“吾十几年来，食不敢常有肉，衣不敢有纯帛，多穿麻葛粗布，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？”司马光一直“恶衣菲食以终其身”，即使妻子去世，也因家中无存钱置办，只能卖地办丧，即有了“典地葬妻”的典故。

勤俭成风，经得住时光。司马光在廉洁自律的同时，亦以言以行教导着身边人。他在世时，率先垂范、克俭于家，严格教导家人及随从做到并保持勤勉节俭、清正廉洁、戒骄戒奢、不贪不腐，遂形成了崇尚勤俭的家风。晚年时，他还专门给养子司马康写下了《训俭示康》，其中讲有“俭，德之共也；侈，恶之大也”“以俭立名，以侈自败”等众多大人为官之道，以告诫后代力戒奢侈、恪守勤俭。

敢于谏言,恪尽职守

“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司马光在朝为官之时，就如同一面“明镜”，既客观真实、不偏不倚、公正不阿，又正人正己、自知自省、恪守本分。

直言进谏，敢于担无人敢当之担。司马光担任过数年的谏官，其间坚守原则、秉公处事、不惧权贵、上谏无数。一方面，他敢于劝谏皇帝。针对宫中盛行大摆宴请的奢靡之风，他上谏《论宴饮状》以请求皇帝能体恤百姓，减少过度的宴饮和赏赐。针对仁宗驾崩后新帝和太后的矛盾，他于1063年先后上书《上皇太后疏》《上皇帝疏》以及《两宫疏》，指出：“金堤千里，溃于蚁穴；白璧之瑕，易离难合”，以劝谏双方相互扶持。针对朝廷下的奢侈浪费和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，他提出“节用之道，必自近始”，以求皇帝克己节约、去繁从简。另一方面，他敢于弹劾权臣。司马光在任权御史中丞时，神宗皇帝想用其亲信张方平为参知政事，他虽与其也关系甚密，但在反复思量后深觉张方平“文章之外，更无所长，奸邪贪猥，众所共知”，故不适合担任此职。

于是两次上奏表示反对，并面见皇帝提出谏言。他廷争面折、针砭时弊、反复上谏、无所畏惧，如此之勇气和胆魄令人敬佩。但忠言往往逆耳，在屡次碰壁、屡次再谏仍无效用后，司马光心灰意冷，决定辞去谏官，专注史学。

度德量力，不去揽己所不能之担。司马光不仅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人之错，也能够勇于直面自身之过。他在早年任并州通判奉命考察麟州屈野河以西筑堡一事时，上报修筑堡垒可以保护边界安宁，但不料筑堡的宋兵被西夏军围困。御史来查案时，庞籍为了让司马光能够回朝上任便一人承担下责任，这使得司马光羞愧难当、食不能寐，于是接连上奏《论屈野河西修堡状》以主动担责，并亲自前往中书省和枢密院以求降罪。司马光对于适合自己并能够胜任的职务，他定发挥所长尽忠职守；反之，对与己不合或不胜其任的职位，即使官阶再高、俸禄再多也绝不受用。如他早年时连写几次《乞龔州状》请求辞去开封府推官这一人人艳羡的高职，认为自己“实非所长”，但都被皇帝驳回了；中年时，提拔其为掌管起草诏令的知制诰，可他认为这一差事并非他之长，于是连上《辞知制诰状》；晚年时哲宗年幼，皇太后想授其为门下侍郎，但他却辞谢道：“龄发愈衰，精力愈耗。”以上足可见其既是敢作敢当的“勇士”，亦是谦逊不骄的“君子”。



为君之道，先存百姓

——《诗经》中的德政思想（一）

□ 郭代杰

《诗经》是关于周代礼乐制度和社会生活的诗集，战国末年被列为“经”，2000多年来，各时期学者为《诗经》所做的论著数以千计，特点各异。但不得不提的就是孔子，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研究《诗经》的第一人，他删诗成300篇，并提出《诗经》的作用应是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即诗经是为治国理政所服务的，是要实现孔子心中的“为政以德”。那么《诗经》是如何体现孔子“德政”思想呢？文章主要是从“修己”、“治人”两方面展开。

“君权神授”一直是殷商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，但鸣条之战、牧野之战等造成政权不断更迭的现象，引起了周朝统治者对于“君权神授”观念的怀疑与反思。既然夏、商之君是“受命于天”，那么他们为何会被天所抛弃，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是否敬天，是否重视民意。因此周人得出了“天命不易”“天命靡常”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的结论，提出了“敬德保民”的政治主张，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的民本思想应运而生。

第一，保民爱民。民为国之本，君以民之安危为安危，重民应是君主循道为政的必然要求。早于孔子100多年的管仲曾提出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

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”。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提出“天道远，人道迩”，孔子在他们的基础上提出了“爱人”思想，抨击残暴统治“苛政猛于虎”，劝导君主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，把教民作为爱民的手段，以德导之，以礼齐之，让百姓有耻且格。

因此，孔子认为倾听民意是非常重要的，他在《孔子诗论》中说通过《国风》可以了解黎民的真实声音，能够体会百姓的忧患情绪，他们的心思尽在《国风》之中。例如《孔子诗论》评论：“《北风》不绝人之怨”，反映了卫国君主残暴无道，黎民怨恨不已，因而纷纷逃亡的情况。因此孔子赞赏有德之君如召公，召公在位政通人和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因此深受民众的拥护。

《国风·甘棠》全诗三章就表达了百姓感怀召公之仁德，为此而爱惜甘棠，不舍得砍伐、折弯，这首诗可以说是爱民的代表诗作。《孔子诗论》评价说，“民性固然：甚贵其人，必敬其位；悦其人，必好其所为；恶其人者亦然”。人们的性情就是如此，“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”，民心所向则众望所归，民心背离则众叛亲离。《大雅·灵台》记载：“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来。”周文王规划修建灵

台，百姓闻讯之后，奋勇争先，乐于为王命效劳，灵台很快就落成了。众所周知文王、召公执政时期，政局比较稳定，君民关系“如埴如瓠，如璋如圭，如取如携”，天下万民宾服顺从。

第二，富民利民，使民以时。民富则国富，民强则国强，国家财政、国君之用皆来源于民，国家的存在，须臾不可离民。因此，国君为了政权的稳定，必须要稳定好根基，满足百姓的日常需求。子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民贫则国贫，百姓足是君足的前提，百姓不足则君足无从谈起，失去了两者之间的平衡，那么社会自然会失序。在孔子看来“薄赋敛，则民富矣”，民富则安，民贫则乱，乱则国危。

《诗经》亦有不少劝导执政者要取民有度、施惠于民的作品，如《国风·硕鼠》中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！”等诗句就运用了借喻的修辞手法，讽刺执政者贪取暴敛，为满足自己的一己之欲，而置百姓于水火不顾，百姓投奔无路唯有流落他乡。再观《小雅·雨无正》有云：“浩浩昊天，不骏其德。降丧饥馑，斩伐四国。”此处怨刺的就是周幽王在位时期天灾人祸的危难情形，他宠信佞臣，加重赋税，造成了周王朝政事荒怠，

百姓饥馑，社会混乱，终而被外族势力所消灭的结局。

其次要“使民以时”，让百姓不违农时的从事农业生产活动，掌握自然规律，创造更多的生产资料。如《周颂·臣工》中“嗟嗟介介，维莫之春。亦又何求？如何新畲？”于皇来牟，将受厥明。”描写的就是周王在籍田间训示农官，需在麦收之后及时地规划田地的场景，引导百姓因时制宜，不浪费上天赐予的丰年。《毛传》说：“田二岁曰新，三岁曰畲。”新、畲表示的就是休耕两年、三年，由此可见，当时全国已经推广了休耕轮种的制度。

此外，《周颂·良耜》还教导农民如何将杂草变为肥料，养育庄稼的具体办法。总之，周王对于农业的重视不言而喻，因为“仓廩实而知礼节”，百姓丰衣足食，民众各得其所，社会才不会出现失序与混乱的局面。



孔子一生从政的时间不长，51岁为中都宰，然后任司空、大司寇兼行摄相事，55岁即辞官周游列国，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从政经历，但是他的言论、行动都突出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所特有的品格和才略。其中，孔子任人唯贤的人才观，冲破了宗法制度任人唯亲的禁锢，从贵族以外的其他阶层中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贤才，使大批有能力

□ 陈力

孔子的人才观

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君主，其成功的秘诀之一，就是任用贤才。孔子认为，政策是依靠人去推行的，贤人在位就会有好的政策；反之，如果没有贤人，再好的政策也推行不了。为了说明人才的重要，孔子还运用“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”的比喻，说明有了贤能的人，推行政策就很迅速，就像有了肥沃的土地，栽种的树木就会迅速生长一样。孔子的弟子仲弓做了鲁国贵族季氏家的总管，问他如何为政，孔子告诉他：要想当好领导，就要给部下带好头，不计较下属的小错误，还要重用提拔优秀的人才。他去看望做武城宰的弟子子游，见面就问：你在这里发现人才了吗？

孔子认为，重用贤才便可以治理天下，即使君主无道，但只要臣子贤明，也能使国家幸免于难。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在卫国时间最长，对卫灵公非常了解，卫灵公私生活混乱，孔子评价卫灵公“无道也”，鲁国国相季康子听后不理解，便问：如果卫灵公无道，卫国为什么不衰反盛呢？

卫国在当时虽然不是最强的诸侯国，但也在强国之列。孔子告诉他，卫国有仲叔圉、祝鮀、王孙贾三位贤明的大臣，仲叔圉负责接待宾客等外交事务，祝鮀负责管理祭祀等内政事务，王孙贾负责统率军队，虽然卫灵公无道，但卫国在三位大臣的治理下，内政外交军事等事务都井然有序，所以依然可以兴盛。孔子很赞赏卫灵公重用人才，还称他为“最贤之君”。孔子没有因卫灵公私生活混乱而否认他在用人方面的才能，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人才的重视程度。

孔子本人十分重视并善于选人用人。他在做中都宰时，之所以能做出“为政一年，四方皆则之”的卓越政绩，是与

他拥有并善于使用一批优秀弟子分不开的。跟随他去中都的弟子，有据可查的就有冉耕、闵损、子路、子贡、颛孙、曾皙、子游、子夏等人。他们参与施政和讲学，帮助孔子处理政事，积极传播孔子的思想。孔子对所带去的弟子进行了妥善的人事安排：派曾皙负责财税，闵损负责司法，颛孙负责公文撰写，子贡负责文化教育。

孔子强调贤才必须德才兼备，但要以德为主。他要求为政者选拔重用德行高的人，认为只有这样的人在高位才能服众。《论语·为政》记载了一个发生在孔子晚年在鲁国做“国老”时的故事，鲁哀公问政。鲁哀公向“国老”孔子请教如何能使百姓服从，孔子告诉他：提拔重用正直的人，把正直的人放在品行不端的人之上，百姓就会服从；反之，如果提拔重用不正直的人，让品行不端的人在正直的人之上，

百姓就不会服从。孔子认为，好的领导，要以德服人。

孔子虽然看重品德，但与后世那些认为有德就有一切，不必培养才能的儒者不同，他主张贤者还必须有才。他说“君子不器”，就是说君子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。孔子在教学活动中，除了以仁、礼熏陶弟子并以文献资料充实其知识以外，还教他们处理政务、管理赋税、主持典礼、接待宾客等，他的许多弟子都成为多才多艺的贤才。比如子贡，学问好，口才好，言语料的高才生，是杰出的外交家，同时还懂经济，会做生意，家累千金，每到一个个诸侯国，“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”。孔子重视全才，但对贤才并不是求全责备，而是主张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。

孔子尤其可贵的是不以出身论英雄。仲弓在孔门弟子中以德行著称，品德学识俱佳，孔子非常喜欢他。但仲弓出身低微，父亲被称为“品行有问题的人”。孔子没有因为仲弓的父亲品行有问题而瞧不起他。在谈论仲弓时，孔子作了个比喻，他说：耕牛的儿子，生着红色的毛与整齐的角，就算不想用它来祭祀，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？古时候祭祀要选择最好的牛、最好的猪，孔子并非在说拿牛作祭祀的事，而是以此为喻，说像仲弓这样的人才，虽然出身低微，但是他的德行非常好，他不出来做官，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呢？国家不可以错过这样的人才。孔子认为，仲弓的出身不应该成为影响他政治前途的因素。孔子高度评价仲弓的才能及德行，认为依其德才，完全可以胜任一个部门或一个地方的长官，这是孔子评价其他弟子时从来没有的高度。在孔子的大力举荐下，仲弓后来做了季氏的家臣。孔子许多出身贫寒的弟子，在他的举荐下都从政为官。比如冉耕为中都宰，子路任蒲邑宰，子游为武城宰，宓子贱为单父宰，冉求为季氏宰，高柴四次为官，做过费宰、郈宰、武城宰和卫国的士师，等等。

经过孔子的倡导，任人唯贤的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儒、墨、法等各家代表人物都提倡尚贤尊贤举贤，历代开明的统治者也都注重形成崇贤举贤之风。